

日本人的历史观

——从民族史观的角度看历史认识问题

归 泳 涛

内容提要： 本文从民族史观的角度，回顾二战以后日本人历史观的演变，提出日本人对本民族近代史的看法，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重建过程。这种民族史观的形成和变化是由战后日本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所决定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就必须超越民族史观的限制，建立起没有民族偏见的亚洲史观和世界史观。

关键词： 日本近代史 民族史 历史认识问题

历史认识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它不仅导致两国政府之间对话的停滞，而且造成两国人民之间理解的鸿沟。对于中日之间那段相互缠绕的历史，双方各执一词，难以达成共识。而媒体对争论的参与又进一步增添了这一问题的感情色彩，把人们的判断简化为非此即彼，善恶对立。应该说，中日两国的学者一直在为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献计献策，并通过各种论坛交换意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双方在认识上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依然没有寻找到获得共同理解的基础。反思国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难发现，我们对日本右翼历史观的分析和批判不可谓不全面、深刻，但是这似乎并不能对解决历史认识问题提供多大的帮助，因为中日认识上的差距不仅仅存在

于中国人和日本的右翼之间，而且存在于中国人和普通的日本人之间。

由于长久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在我们的意识中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不变的”日本意象——一个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几十年一以贯之拒不谢罪”的日本右翼或日本政府的意象，一个是和日本政府区分开来的“友好的”日本人民的意象。但是，当我们在批判右翼的观点时，发现大多数日本人并不一定站在我们一边，这使很多人感到

例如，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日本研究青年论坛，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日本日中技术留学交流协会共同主办的中日青年论坛，这两个论坛每年邀请中日青年学者参加，以增进相互了解，讨论会的论文集均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孙歌：《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1页。

迷惘甚至愤懑。我们所能做的似乎只剩下疾呼日本的“右倾化”趋势,而对普通的日本人究竟怎么看历史仍然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笔者以为,有必要从更宏观的层次上去把握一般的日本人、而不只是右翼的历史认识。

因此,本文所说的“日本人”,是指一个整体,或者说大多数。而所谓“日本人的历史观”,也就是指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历史观。这种民族史观是指,一个民族的大部分成员如何记忆、叙述和评价本民族的历史,如何界定本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民族史观的特点是,它不是旁观者的看法,而是本民族的自传。与个人自传不同的是,民族总是被想象成将会永远存在下去,所以民族的自传也就随着民族历史的发展而被不断地重写。但与个人自传相同的是,民族的自传也往往是人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对自己过去的筛选,这种溯流而上的记载方式,使民族史的叙述带上时代的烙印。可以说,民族史观中很难有类似“定论”的东西,而且常常会“当局者迷”,因为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往往用有限的、片面的经验去诠释民族的历史。因此,民族史观是与时俱进的,它与其说是对过去的叙述,不如说是对现在的评价和对将来的指向。

本文主要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二战以后日本人历史观的重建过程,揭示这一民族史观形成和演变的背景,希望可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提供一种可能的理论视角。民族史观涵盖一个民族全部的历史,可谓浩瀚深邃,这里我们只选取日本人对日本近代史的看法作为分析的对象,因为关于近代日本的想法实际上对战后日本人历史观的形成起

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战后初期民族史观的解体和重建

众所周知,二战前和二战中日本人的民族史观是军国主义思想支配下的皇国史观。这种历史观毒害了日本民族自身,使日本走上了极端民族主义的道路。战争的灾难迫使日本人痛定思痛,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观。人们不再相信军国主义者所宣扬的关于日本民族的种种神话,转而对本民族走向战争灾难的近代历史进行解剖和批判。而战后“和平宪法”的制定,以及围绕这部宪法所展开的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使和平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可以说,绝大部分日本人在思想上与皇国史观发生了决裂,“万世一系、八纮一宇”的民族史观土崩瓦解。

所以说,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观是在经历了“解构”之后,开始其重建过程的。而承担这一“解构”任务的正是战后和平民主思想的倡导者们——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以丸山真男、大冢久雄和川岛武宜等人为代表的近代主义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丸山真男于1946年5月在《世界》杂志上发表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一文,成为日本战后思想的开山之作。紧接着,大冢久雄于1947年4月和1948年5月分别发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系谱》和《近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分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235页。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代化的历史起点》,川岛武宜也于1946年6月发表了《日本社会的家族式结构》,他们和丸山真男一道举起了“近代主义”的大旗。具体来说,丸山真男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由天皇制、军部、官僚构成的三位一体的“超国家主义”结构,认为这种体制造成了日本国民自我意识的缺失;大家久雄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认为日本没有出现市民社会应有的近代人的自觉意识,由此对日本近代化的道路作出了否定的结论;川岛武宜则从法律社会学的观点,提出是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天皇制意识形态,导致了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延伸到国家层次,并发展成极端的国家主义。可以看出,这三人分别在国家、民众、社会三个不同的层次上,论证了同一命题,即战前日本的“前近代性”是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根源。因此,近代主义者对近代日本史的评价从总体上说是否定的。在他们眼中,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代化只停留在物质、技术的层面,由于在精神上没有确立人的主体性,没有完成民主化的任务,因此使前近代的因素得以残留并与近代极权主义结合在一起。他们由此主张,战后日本必须在新宪法的基础上,展开彻底的民主改革和“精神革命”。

近代主义者对日本近代化道路的否定以及要求民主化的主张构成了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人历史观的主流。他们的著作成为大学课堂里的教科书,他们的主张成为当时日本人热烈讨论的话题。但是,这样一种否定本民族近代历史的民族史观在民族主义的发展中是不多见的。因为大凡近代民族,都是通过构筑本民族同仇敌忾、反对外来压迫的历史来确立民族认同、增强民族

凝聚力的。撰写本民族的英雄历史往往是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近代主义者是反对民族主义的。事实上,他们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彻底反思日本的近代历史,从而创造日本人新的民族认同。近代主义者们的民族史观实际上是他们自身战争体验的理论化。他们在战争中深切体会到,弥漫在日本军队甚至整个社会组织中的那种封建性的权威主义思想是如何毒害了一般大众,如何把日本民族引向了灾难。这种共同的战争体验和记忆构成了当时近代主义者、也是大部分日本人共有的思想基础。所以近代主义者的历史观,实际上就是要用民主主义的民族史去代替国家主义的民族史。丸山真男甚至认为,日本近代史的开端应该从1945年,而不是1868年算起,这突出地反映了他重建日本民族史观的思想。

同时,近代主义者的“废旧”也是伴随着“立新”的。他们批判近代日本的工具,或者说他们所依赖的价值标准,是以欧美近代社会为原型的“近代性”。在他们看来,这种近代性的核心是民主主义。丸山真男竭力从日本自己的近代和前近代历史中去寻找这种近代性。他解读《文明论概略》,

关于丸山真男、大家久雄、川岛武宜主要观点的概述,参见纪廷许:《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历史系200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第6-7页。

关于近代主义者“精神革命”的主张,参见[日]平石直昭:《作为理念的近代西方》,载中村政则等编:《战后思想和认识》,东京: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53-86页。

[日]丸山真男:《复初之说》,载《世界》,1960年8月号,第367-371页。

对福泽谕吉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强调其思想和方法的启蒙意义和近代价值。他还深入研究日本的政治思想史,探寻日本儒学、国学和徂徕学的相互关系,论证日本传统是如何在西学到来之前“自我地”走向“近代”的。这些研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几乎成为知识阶层中人人熟知的学说。我们不难看出,丸山真男虽然对战前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作了无情的批判,但他本人却对日本民族抱有深厚的感情。他强烈地希望日本人可以通过塑造独立的“个性”来重建基于个人自由的民族主义。因此,他给予福泽谕吉思想和徂徕学特别的关注,以确立本民族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在战后日本,与近代主义思想并驾齐驱的另一股强大思潮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尤其是在历史学领域,可以说直到冷战结束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占据着日本历史研究的主流地位。由于日本共产党是在战前和战时唯一坚持抵抗军国主义的力量,所以在战后初期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和影响力。尽管近代主义者主张的民主改革意味着建立西方式的自由主义秩序,而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民主要求则指向社会主义,但两者在否定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在战后初期,近代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道担负起了指引日本和平主义思潮的历史使命,在历次重大的和平民主运动中结成联盟,反对保守政权和日美同盟,并在1960年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中把和平民主运动推向了顶点。

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为我们所熟悉,可能也是和我们一般认识的日本近代史最

为接近的,即认为明治维新建立起的封建军事性的政治体制,是近代日本逐渐走向对外侵略与扩张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与近代主义者以欧美为工具和标准否定日本近代史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近代化的参照系。而当苏联的霸权行径激起了日本左翼的反对时,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将自己的政治认同更多地转向了中国,认为中国的民族革命,而不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才是亚洲人民走向近代化的正道。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中,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近代史是被全盘否定的。

不论是近代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都进行了否定,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如果对自己产生的历史都否定的话,那还如何确立自己的历史合法性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特殊历史观的产生是由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决定的。因为战后初期的日本,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人民大众生活困顿,而这一切都是战争带来的。所以,对战前和战时的体制深恶痛绝可算是发自内心的人之常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近代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把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看作是半近代、半封建的社会,认为不彻底变革这样的社会,日本就不能实现真正的近代化或者不能取得革命的

参见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参见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关于丸山真男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内涵,参见盛邦和:《丸山真男:传统演化与文化的现代化》,载《日本学刊》,2002年第3期,第110-122页。

最后胜利。严酷的社会现实还促使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不得不从本国之外寻找参照标准来界定日本“应有的民族认同,在近代主义者那里,是“作为理念的西方”,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则是“作为理念的中国”。两者只是分别借用西方和中国来界定近代日本的对立面,所以,“近代的西方”和“革命的中国”都不过是他们理想的寄托而已。

这样的民族史观虽然为“废旧立新”开辟了道路,但也存在着不足。在“废旧”方面,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和皇国史观虽然被清算,但这种清算只是限于本民族内部的。人们只是感到自己受了军国主义者的骗,才走上了错路,遇上了灾难,因此主要是以受害者的心态来反省自己的民族历史的,而对作为加害者的历史的反省是比较单薄的。当然,这里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战后的日本被美国纳入其东亚冷战的同盟体系中,和其它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很少,因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给亚洲人民造成的苦难和创伤是缺乏深入的了解的。

在“立新”方面,知识分子虽然为日本民族认同的重建指出了方向,但正像上文所述的那样,这种重建仍然停留在理想、理念的阶段,尚缺乏现实的历史去支撑。新的民族史观的建立,归根到底还要依赖于日本人民创造新的民族历史,让和平、民主真正在现实中、而不只是在理想中成为民族认同的要素。事实上,以社会党、民社党、工会、知识分子、学生为主要成分的革新阵营,确实在战后历史上领导了反对片面媾和、维护和平宪法、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反对原子弹氢弹、反对越南战争等一浪接一浪的和平民主

运动,这些运动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成为战后日本历史的亮点。而对这些运动的记忆和叙述也自然地成为日本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遗憾的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这些和平民主运动并没有成为此后日本民族史观发展的主流。战后初期的进步知识分子始终站在反体制的立场上,要求彻底改革现实政治,在他们那里,否定日本近代史和否定保守政权,只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尽管他们的思想和运动也影响了政府的政策,特别是促使政府维护了“和平宪法”,但他们的民族史观仍然与官方的思想相对立。当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社会趋向安定和富足,保守政权趋向长期化,官方的民族史观也就开始抬头,并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

二、日本近代化论与“脱亚入欧”的民族史观

如上文所述,战后日本的民族史观在近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进步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开始了解体和重建的历程。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对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代史作彻底的解剖和批判,同时通过战后的和平民主运动重建新的民族历史。这样的历史观是建立在日本人共同的战争体验和战后日本脆弱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特别是高速增长长期的到来,日本人

[日] 平石直昭:《作为理念的近代西方》。

山室信一:《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基轴的转移——及其与日本社会变迁的响应》,载徐静波、胡令远编:《战后日本的主要社会思潮与中日关系》,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1页。

的历史观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知识界就出现了重新评价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代化的观点。但这一新的思潮真正影响整个日本论坛,还是在六十年代特别是1960年的安保斗争以后。在这方面,美国现代化理论对日本的渗透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现代化理论于五十年代在美国学术界兴起,并成为此后支配美国社会科学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一种冷战“意识形态”。这一理论的基本特点,是以数量化的指标来定义现代化的内涵,从而把全世界各地的发展都纳入一个单一的线性进程,按照这一理论,所有的国家都将通过同样的经济发展过程走向现代化的顶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在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观中,日本是唯一成功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的非西方国家,所以理应成为新兴独立国家学习的样板。

现代化理论通过和美国的日本研究相结合,渗透到日本的学术界。美国的亚洲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于1961到1968年召开了六次国际学术会议,讨论日本的近代化问题。这些会议的特征,一是邀请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学者人数相当的日本学者参加,二是试图用美国的现代化概念取代在日本学界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史观,作为研究日本近代史的分析框架。而作为这些会议的预备会议的箱根会议,则成为现代化理论引入日本的标志。这次会议于1960年8月29日到9月2日在日本的箱根召开,参加者有美国的著名日本研究专家赫尔(John W. Hall)、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以及来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的美英学者,而

日本方面则有丸山真男、川岛武宜、加藤周一、远山茂树等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现代化”的概念。赫尔在会上提出了衡量现代化的客观标准,包括城市化、识字率、人均收入、个人流动性、工业化、大众传媒、官僚制度,以及理性化等等。显然,这些标准强调了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层面,因此遭到了很多日本学者的质疑。丸山真男认为赫尔的客观、量化的标准忽视了个人的价值体系。川岛武宜也撰文批评这次会议把民主的价值观排除在现代化的分析框架之外,指出对日本人来说,民主化的问题至关重要,“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远山茂树也分析了日美现代化标准的差异,认为前者强调质的变化,后者强调量的变化。在他看来,近代化问题之所以在日本引起关注,是因为战后日本面临着怎样实现民主化这一首要的现实任务,而美国无非是想强调日本在物质方面的近代化成果以作为欠发达国家学习的样板。

例如,[日]桑原武夫:《明治的再评价——走向独立的意志和近代化的意欲》,载《朝日新闻》,1956年1月1日。

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6页。

John W. Hall,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in Marius B. Jansen ed., *Changing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Moderniz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26 - 27.

[日]川岛武宜:《近代日本的社会学研究》,载《思想》,1961年4月号,第484-485页。

[日]远山茂树:《即使现实和传统相异学者间的合作仍然可能》,载《每日新闻》,1960年9月8日。

尽管观点不同,但近代日本研究会议受到美日双方学者的欢迎而得以继续,并且直接引发了战后日本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讨论,即“近代化论争”。论争的焦点是近代化的定义以及对日本近代化的评价,而站在论争最前沿的正是肯尼迪总统任命的新驻日大使、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赖肖尔把恢复美国和日本革新阵营、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作为对日外交的主要任务,他在1961到1966年任驻日大使期间,利用日本的报纸、杂志、电视等传媒以及他在各大学的演讲,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历史观和重新评价近代日本的文章和讲演,成为在日本鼓吹美国现代化学说的先锋。他宣称,日本的民主主义并非是二战后美国占领改革的结果,而是在本质上植根于日本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中,而明治以后的七十年正是一段典型的民主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在此期间日本取得了欧洲用几个世纪才获得的成果,因此日本模式而不是中国模式,应当成为亚洲国家的楷模。他还提出,日本和西欧共有的封建制度的某些特性,是促进近代化的重要因素。这暗示着,日本是一个更类似于西欧的国家,而并非亚洲国家中的一员。

赖肖尔的言论在日本的思想界、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他对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日本竭力褒扬,这与近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近代日本评价针锋相对,而早已被日本学界否定的前近代的封建性,在赖肖尔这里也成了促进近代化、而非阻碍近代化的因素。因此,近代主义者们在各种公开讨论中和赖肖尔展开了激烈争论,而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撰文揭露赖肖尔的“近代化论攻势”,称其为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政策。然

而,从此后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看,赖肖尔可能更有资格自称为这场争论的胜利者。因为当时的日本论坛上,已经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近代日本的潮流,赖肖尔只不过是推波助澜者之一而已。

日本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杂志《中央公论》从1961年6月开始发起了对日本近代化问题的讨论,邀请了中山伊知郎、尾高邦雄、蜡山政道、松本重治等知名学者撰稿,还从1961年6月到12月连续六期登载了题为《近代日本》的系列文章,并于1962年起连续12个月刊登了连载文章《明治维新的再评价》。尽管这些文章的观点各异,但一个总的趋势是强调近代日本光明的一面。这一趋势也出现在其它重要的综合杂志中。《文艺春秋》刊登了由评论家福田恒存撰写的六篇关于日本近代化的连载文章,其中对赖肖尔的近代日本观和实用主义方法论倍加赞赏,认为这是对左翼历史观的沉重打击。《文艺春秋》还在1964年8月和1965年7月刊载了两篇专题文章,题目分别是《近代日本的一百位巨人》和《现代日本的一百人》。笔者在这里引用这两篇文章开头的编者按语,因为它们确切地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历史观的变化。“明治一百年——东亚的一个小国,日本,曾被西方列强席卷东亚的狂潮所裹挟,但明治维新催生了日本的近代化,自那时以来已将近一百年了。在

[日] 赖肖尔、中山伊知郎:《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评价》,载《中央公论》,1961年9月号,第84-97页。

[日] 赖肖尔:《日本与中国的近代化》,载《中央公论》,1963年3月号,第60-70页。

参见[日]《中央公论》,1961到1962年各期。

[日] 福田恒存:《所谓赖肖尔攻势》,载《文艺春秋》,1963年10月号,第70-80页。

这期间,日本经历了战争(日清、日俄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等),经历了社会制度的变革(明治宪法的制定、终战后的新宪法制定),经历了灾害(关东大地震、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灾难),还经历了科学文明的令人惊异的进步,虽然也曾有过在内忧外患的狂澜中濒临沉没的时刻,但是不管怎样日本已经超越了这些而抵达今日。”战后二十年——使大半国土化为废墟的战败!自那时以来已二十年了。在这期间,世界形势激荡起伏,尽管是他人所施,但日本毕竟完成了许多社会变革(新宪法的制定、农地改革、工会的确立等),引进了许多科学技术,不管怎样已走到了先进国家的位置。”

这种新历史观的背后,是战后日本正在走进一个新时代的社会现实。安保斗争以后,日本大众对政治的关心明显下降,而六十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特别是池田勇人首相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使战后日本进入到大众消费的时代。日本人的自信心得以恢复,新的民族主义浪潮开始兴起。一时间,“日本大国论”、“国家利益论”、“民族意识论”等主张在论坛上兴起。新一代舆论精英也开始崭露头角,林健太郎、猪木正道、高坂正尧等学者争相呼应赖肖尔的日本近代化论,举起了批判左翼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大旗。他们认为,明治维新的世界史意义在于使日本参加到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并作为一个非白人、非基督教的国家,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因此明治的阴暗面虽不能被忽视,但光明的一面是具有压倒性的。他们还提出,日本本质上不是一个亚洲国家,因而摆在日本面前的唯一

道路是彻底完成“脱亚”的过程从而发展成一个“远西国家”(Far Western Country)。这意味着,效法美国的现代化道路并和美国结盟是日本自然而理性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也直接参与到民族史观的重建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事件,便是佐藤政权所策划的“明治百年纪念”。1968年正好是明治维新一百年,对保守政权来说,大张旗鼓地开展纪念活动,对明治百年歌功颂德,无疑是肯定战后二十年历史的有效手段,因为在日本近代化论的理论支持下,战后二十年和明治百年将同样因其在物质、技术方面的进步而得到肯定。当时政府的宣传资料里这样写道:“迄今为止一直鼓舞我国国民的‘赶超欧美’的目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因此,完成了吸收先进诸国的文明、并赶上了它们的我国,正在变成发展中的邻国寻求指导和援助的对象。而另一方面,由于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破坏正变得越来越显著,重新评价久违的东方价值和日本价值的适当时机已经到来。”在这里,明治百年史被描绘成了一段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具有连续性的民族史,而近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被认为应该通过复兴本民族的传统价

[日]《近代日本的一百位巨人》,载《文艺春秋》1964年8月号,第166页;《现代日本的一百人》,载《文艺春秋》,1965年7月号,第178页。

[日]猪木正道:《明治的世界史意义》,载《文艺春秋》,1965年1月号,第79-84页。

[日]高坂正尧:《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载《中央公论》,1964年9月号,第53、58页。

内阁总理大臣官方《明治百年纪念准备会议资料》,1966年1月2日,转引自[日]金原左门:《日本近代化论的历史像——批判性检讨的视点》,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1968年版,第272-273页。

值观来消解。

政府的这种意图,很自然地遭到以历史学家为首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舆论界一时间掀起了关于明治百年纪念的争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大众对这场争论并未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他们只把明治百年看作一般的纪念活动。当时朝日新闻社的全国舆论调查显示,对举行明治百年纪念活动赞成态度的人占53%,认为无此必要的占26%,其它回答或没有回答的占21%。而另一项调查则显示,即使是在传统的反对党社会党和民社党的支持者中,赞成意见也分别达到51%和58%。这表明纪念活动得到了大部分日本人的支持。事实上,当时享受着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富裕生活的日本人,已经不像保守或进步的政治家、知识分子那样去考虑这个纪念活动背后暗含的深刻意义,而只是对一百年来日本近代化在“总体上的”成功感到满足和自豪。而一般大众的这种态度也正好符合政府的意图,因为后者最希望强调的就是日本近代体制无可否认的贡献和成就,并急于根除使战后日本社会始终无法形成共识的自我批判的思潮。正像赫尔当时评论的那样,“在思想争论的表面之下,新的一代人正在出现,对现实的自信使他们对关于历史的争论缺乏兴趣,这其中包括那些不再拘泥于旧的记忆和过时的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六十年代后参与重建新的民族史观的不止是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及政府,新历史观还以文学的形式渗透到日本大众当中。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当属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司马辽太郎从1956年开始到1988年为止一共出版了57部小说,几

乎获得了日本所有著名的文学奖,可以说是战后日本最受欢迎的小说家。而司马辽太郎的时代也恰好是战后日本经济起飞并达到顶峰的时期,因此,他的历史观也就不免要刻上近代化论的烙印。司马辽太郎虽然也对近代日本做了批判性的剖析,但其小说之所以受到日本大众的喜爱,却还是因为它们当中一以贯之的乐观态度以及对明治人物的颂扬。在他笔下的明治人,都有着开朗豁达、勇敢向上、淳朴执著的性格,都深爱着自己的民族并愿为其献身,他们的身上既汇集了日本民族的传统美德,又吸收了近代文明的进步精神,而由这样一群明朗的人物所代表的时代也就自然成了一个光明的时代。不可否认,司马辽太郎所强调的近代日本的积极因素并非虚构,确是基于历史的事实。他的积极向上的历史观也确实鼓舞了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人,将一种久违的民族自信注入了人们的心田。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一味渲染近代日本光明的一面,回避阴暗的一面,“司马史观”在本质上与近代化论的历史观相一致,也与贯穿日本百年历史的“脱亚入欧”思想一脉相承。

参见[日]金原左门:《‘近代化’论的转变和历史叙述——政治变动下的一种史学史》,东京:中央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140页。

Marius B. Jansen, "Japan Looks Back," *Foreign Affairs*, Vol 47, No 1, Oct 1968, pp. 36 - 50.

John W. Hall, "Reflections on a Centennia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7, No 4, Aug 1968, pp. 714 - 715.

参见佟君:《论司马辽太郎的日本国家史观》,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57-61页。

参见张曙琴:《论司马辽太郎的战争观》,载《日本学刊》,2000年第1期,第138-148页。

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在日本家喻户晓,可以说,很多日本人的历史观更多的是来自于司马的小说,而不是历史教科书。当今日本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也是坂本龙马那样的明治人物。和战后初期的进步知识分子、六十年代以后崛起的现实主义知识分子以及策划明治百年纪念的日本政府不同,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观并无直接的政治意图,他的受欢迎表明,肯定日本百年近代史的潮流已经超出政治和思想辩论的领域,而深入到一般大众当中。战后日本的民族史观正是在这里,完成了其重建的过程。

结 论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民族史观的重建经历了一个长期变化的过程,总的来说是从批判明治维新转向颂扬明治维新,从否定日本近代化传向肯定日本近代化。前一种民族史观建立在日本人对战争的共同体验、记忆和反思之上,又与战后初期日本动荡不定的社会现实相联系。在这一时期,进步知识分子为重建日本的民族史观作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所倡导的和平民主思想虽已不在高潮,但却潜移默化到人们的深层意识中,成为日本人民族历史和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此,尽管右翼的叫嚣在战后几十年中从未偃旗息鼓,并且在今天仍然扰乱着人们的视听,但他们想让日本走上战前的老路已经不太可能。

后一种民族史观的确立标志着日本人战争体验的“风化”和民族自豪感的重建,是随着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逐渐形成的。这种历史观存在着回避战争责任、美化本民族历史的弊端,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其赖以存

在的深厚社会基础。为这种民族史观提供依据的现代化理论,尽管有缺陷,但也确实反映了世界近代史和日本近代史中一条重要的线索,即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此是很难做出全面的否定的。另一方面,这种民族史观的兴起,也是和战后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密不可分的,是日美同盟长期化、固定化的结果。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始于占领改革,并经过日美同盟几十年的经营不断深化。如果说在战后初期日本的未来走向尚不明朗的话,那么到六十年代以后,日美同盟已经开始逐渐为大部分日本人所接受。这种对美国的认同不仅发生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而且也发生在价值观、文化的领域。因此,“脱亚入欧”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日本人历史叙述的主流。这使得日本人基本上认同了美国或西方意识形态背景下的现代化史观,即使对现代化作出批判也只是在西方的语境中进行,而对于现代化固有的更深层的代价,即这一过程本身所包含的剥削、压迫和奴役的必然性,则缺乏真正的批判。具体到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人对自身现代化的反思大多只限于环境破坏、道德颓废等物质主义的问题上,而对其引以为豪的现代化的“成功”所伴随的代价——对亚洲人民的侵略和掠夺,是反应迟钝的。

同时还应看到,民族史观虽然是民族认同得以形成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但它本身对不同国家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相互理解是有阻碍作用的。因为这种历史观归根到

日本学者小熊英二使用“风化”一词描述日本人战争体验的变化,参见[日]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公共性》,东京:新曜社,2002年版。

底是每个民族自我的,而不是国际的。这就难免把本民族的经验视为普遍的和唯一正确的,从而忽视了别的民族基于不同经验的历史观。所以,要真正解决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只能循序渐进,从长计议。只有当中日双方都能超越民族史观的层次,在亚洲的、世界的层次上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历史,才能真正建立起关于历史问题的共识。

而要扭转日本人“脱亚入欧”历史观的片面性,从根本上说还要靠中国等亚洲国家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因为只有当现实中的西方已经不再是世界的唯一中心时,人们才能真正摆脱“西方中心”史观的束缚。

作者简介:归泳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02级博士生。北京,邮编:100871

征稿启事

《太平洋学报》是由国家一级学术组织——中国太平洋学会主办、太平洋学报杂志社出版的大型综合类但以国际问题为主的学术期刊,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亲任编委主任,一大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定期撰稿,是学界、产业界和政府官员进行学术研讨和工作交流的权威平台。

《太平洋学报》版面精耕细作、内容丰富翔实。主要栏目有太平洋动态、专题研讨、热点观察、观点、评论、学术论文、跨国企业研究、权威发布等,栏目设置和文风既具有一般刊物的可读性和欣赏性,又具有学报的深度和力度。

为了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太平洋学报》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踊跃惠稿。

稿件要求

1. 文稿观点明确、论据充分、文字精练、数据可靠、结构严谨、逻辑性强;
2. 学术论文一般在1万字以下,请在正文前附200字的内容提要、关键词和作者简介并附上论文题目的英文译文。动态、观点、评论和报道性文章不得超过3000字;
3. 编辑部对稿件有修改权,如有特殊情况请在稿件中注明;
4. 本刊有权对所投稿件结集出版,有权在本刊网络版发表;
5. 作者文责自负,请勿一稿多投;

来稿除文稿外另附磁盘或发送 E-mail: likehome@public.bta.net.cn 或者 pj55@tom.com 否则不予采用;

6. 由于人力有限,恕不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3个月内未见本刊发表或通知采用者,作者可另行处理。

来稿请寄: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太平洋学报杂志社 邮编:100732

电话:(010)85196348 联系人:陈骅